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十三編 第 10 冊

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

葛 琦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三編

曾永義主編

第10冊

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

葛琦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葛琦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20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10 冊）
ISBN 978-986-404-586-0（精裝）
1. 元雜劇 2. 戲曲評論
820.8 105002165

ISBN-978-986-404-586-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十冊 ISBN：978-986-404-586-0

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

作　　者 葛 琦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78759 字
定　　價 十三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

葛琦　著

作者簡介

葛琦，女，漢族，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文學博士。任教於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主要致力於古代文學研究，以宋元文學爲主要研究方向。發表過數篇相關論文，如《蔣捷詞中的生命意識》、《論唐宋詞中的愁情》、《元雜劇大團圓結局成因研究述評》、《試論王國維悲劇理論及其發展》、《三十年來元代文人心態研究綜述》、《「三言」中的蘇軾形象》等，主持完成內蒙古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元雜劇創作中的民族文化交融》。

提　要

近年來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中，多元文化背景已經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書的研究重點在於宏觀把握雜劇中的人物形象，發掘其中與民族文化交融相關的形象進行分析，探尋其中的關聯與意義。第一章概述元雜劇創作的時代背景，即對當時民族文化交融的社會狀況的介紹。包括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涉及社會環境、政策法規、經濟文化、風俗習尚等多個與雜劇創作相關的方面。第二至第四章爲個案研究，以能反映民族文化交融爲取捨標準，從現存雜劇劇本中選取 130 多個人物形象，分別探討雜劇中的女性形象、書生和商人形象、官吏和宗教人物形象在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的發展變化，以及由此表現出的元代女性觀、愛情觀、功名觀、商業觀、宗教觀等思想觀念的變化。通過縱向和橫向的對比研究，發掘元雜劇人物形象的獨特之處，這也正是其時代特色——民族文化交融帶來的新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次

緒　論……1
　一、研究狀況與選題意義……1
　二、研究對象及主要研究方法……7
第一章　元雜劇創作的時代背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時代……9
　第一節　社會政治經濟背景……9
　　一、疆域闊大，人口眾多，多民族雜居共處……9
　　二、城市經濟發達，市民階層崛起，享樂之風盛行……13
　　三、知識分子地位與較爲寬鬆的思想政治環境……17
　第二節　思想文化背景……24
　　一、儒家思想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互相影響……25
　　二、元代宗教對雜劇創作的影響……32
　　三、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語言文字及婚俗等對雜劇創作的影響……37
　小　結……44
第二章　元雜劇中的女性形象……47
　第一節　雜劇中的佳人閨秀形象……51
　　一、崔鶯鶯形象之發展……51
　　二、其它閨秀形象的發展……57
　　三、民族文化融合與對傳統閨秀形象的改變……59

第二節　雜劇中的風塵女子形象……63
一、元代的妓女行業……63
二、正面的妓女形象……66
三、從良後的妓女形象……75
第三節　雜劇中的其它女性形象……79
一、賢妻良母……79
二、地位卑下的侍女丫鬟……90
小　結……95
第三章　元雜劇中書生、商人形象……97
第一節　雜劇中的書生形象……97
一、才子佳人劇中的書生——以張生爲代表……97
二、其它雜劇中的書生……109
第二節　雜劇中的商人形象……116
一、元代之前的商人形象及相關背景……117
二、雜劇中的正面商人形象……124
三、雜劇中的反面商人形象……140
四、商人形象與民族文化交融……145
小　結……146
第四章　雜劇中的僧道官吏等人物形象……149
第一節　雜劇中的官吏形象……149
一、雜劇中的包拯形象與民族文化交融……151
二、雜劇中其它官吏形象與民族文化交融……159
第二節　雜劇中的宗教人物形象……163
一、難以忘「情」的宗教人物……164
二、難抵凡塵困擾的宗教人物……171
第三節　雜劇中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180
一、愛情婚姻中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180
二、少數民族將領形象……182
三、少數民族官吏形象……189
小　結……191
結　語……193
參考文獻……195
後　記……205

緒　論

一、研究狀況與選題意義

在中國文學史上，諸子散文、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各領一代風騷的重要文學樣式，它們在發展中與時代息息相關，處處彰顯了時代賦予它們的獨特個性。通過對這些文學樣式的研究，可以看出各個時代的風貌。

元雜劇是中國戲劇史上第一種成熟完善的戲劇形式，它作爲元代的「一代之文學」〔註1〕，引領了中國文學及其審美取向由雅向俗的轉變。元雜劇批評，是伴隨著雜劇的產生和發展同步進行的，元明時期產生了大量的曲論著作，如夏庭芝的《青樓集》，記錄歌妓藝人的表演和生平；鍾嗣成《錄鬼簿》和無名氏《錄鬼簿續編》記載元曲的作家里籍、生平、著述情況等；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不僅載有元明時期的雜劇劇目、分類、作家風格等等，還整理了元曲的曲譜；何良俊的《曲論》注重曲詞的意趣，強調音律爲先；王世貞的《曲藻》重視作者的學問和才情，並把元曲的地位提高到與詩經、漢賦、唐宋詞同等的位置。這些作品雖然缺乏完備的體系，但保留了寶貴的歷史資料，爲後人的研究做了較爲充分的資料準備工作。王驥德的《曲律》對於戲劇的創作、批評、聲律、表演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戲曲理論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對李漁的《閒情偶寄》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李漁的《閒情偶寄》汲取前人觀點，聯繫自己的創作實踐，揭示了戲劇創作的規律，建立了完整的戲曲理論體系，是我國戲劇批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註1〕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20 世紀初，上海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了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吳梅的《顧曲麈談》，「在中國古代戲曲研究領域篳路藍縷，開風氣之先，均爲爲中國戲曲研究的奠基之作」〔註 2〕。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將西方現代美學理論與傳統考據方法相結合，改變了以往以實用爲目的的研究，把中國戲曲作爲客觀的研究對象，用新的美學觀念加以理性的研究，闡明了中國戲曲的審美特徵，開啓了古典戲曲研究的許多新領域，對後來的研究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吳梅則致力於戲曲本體的研究，尤以曲律論、製曲論、度曲論最具代表性，構成了完整的戲劇研究體系。錢基博評價說：「曲學之興，國維治二三年，未若吳梅之劬以畢生；國維限於元曲，未若吳梅之集其大成；國維詳其歷史，未若吳梅之發其條例；國維賞其文學，未若吳梅之析其聲律。而論曲學者，並世要推吳梅爲大師云。」〔註 3〕較爲準確地概括了兩人的研究特點。

20 世紀初至今，元雜劇研究已有百年歷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 世紀的元雜劇研究主要從內外兩個方面進行。外在研究注重史料的鉤稽整理，主要包括元雜劇史、元雜劇整體狀況、發展分期、演出狀況、對後世的影響，以及作家作品的考證、作家生平研究、作品歸屬等問題的考訂、整理。鄭振鐸、趙景深、顧隨、隋樹森、王季思、杜穎陶、吳梅、傅惜華、徐調孚、莊一拂等前輩學者的辛勤努力，爲元雜劇研究提供了較爲充足可信的史料支持，爲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保障。雜劇的內在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包括雜劇體制研究、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研究、悲劇性和喜劇性的研究等等。這個時期的研究，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拓展研究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同時也在建立新的研究體系等方面留下了空間。

從 20 世紀 80 年代至今，是元雜劇研究取得長足進步的 30 年。研究者擺脫政治批判對學術探討的影響，採取更加客觀公正的態度看待元雜劇，特別是把民族文化融合納入元雜劇研究的視野中來，對研究對象的把握更爲準確、全面。

元代的統治者是蒙古族，其它少數民族在當時的地位也相對較高，他們的文化、習俗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個社會呈現出迥異於傳統的思

〔註 2〕郭英德、王瑜瑜：《吳梅詞曲研究論著述評》，見吳梅：《吳梅詞曲論著四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 476 頁。

〔註 3〕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82 頁。

想文化形態。而元雜劇作爲一代文學之勝，是社會生活的微觀再現，反映了所處時代的主流文化，即由北方少數民族帶來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傳統的農耕文化碰撞交融，進而整合生成的多元文化。

在這方面，20 世紀後 20 年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80 年代的此類研究只注重少數民族的音樂歌舞、作家演員等外在的因素對元雜劇發展的影響，沒有涉及少數民族文化的其它方面。如門巋的《談兄弟民族對元曲發展的貢獻》〔註 4〕，文章發表於 1985 年，受時代的影響很大，在語言的使用和觀念上都有明顯的時代烙印。

90 年代初，提出元雜劇產生的背景與元代的文化，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關係密切。如張應《元曲與少數民族文化》〔註 5〕中，已經明確提出「金元時期，是各民族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時代。少數民族文化以其風標獨異的姿態，如泉湧般地注入中原漢族傳統文化的肌體中，促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嶄新面貌。元曲就是這種文化大背景的產物。」不僅從音樂舞蹈、作家演員等方面論述，更是提到元代思想文化氛圍和社會風俗變遷有可能對元曲發揮作用，雖然作者只是提出了可能性，並未深論，但對於拓寬元曲研究的門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後，田同旭在《元曲研究的一個新思路——論草原文化對元曲的影響》〔註 6〕中提出元曲繁榮在蒙古民族作爲統治民族的時代，草原文化對元曲必然有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不僅在於胡樂的音階調式，更在於草原民族的精神與性格。元雜劇與民族文化融合開始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李修生的論著《元雜劇史》〔註 7〕中專設一節《元雜劇與蒙元文化》（第一章第三節），強調認識蒙元文化背景對於研究元雜劇的重要性，指出一方面「元雜劇是中原文化的產兒」，另一方面「只有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元雜劇才能得到這樣的發展」，並從多元文化並存、俗文化興盛、語言文化等幾個方面去論證。黃天驥先生在爲該書所作序中更指出，如果不具備對於蒙元文化背景的知識，「不足以論元劇」。葉蓓《淺析蒙古族文化對元雜劇形成及發展的影響》

〔註 4〕門巋：《談兄弟民族對元曲發展的貢獻》，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5 年第 2 期，第 75～79、93 頁。

〔註 5〕張應：《元曲與少數民族文化》，載《民族文學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32～38、31 頁。

〔註 6〕田同旭：《元曲研究的一個新思路——論草原文化對元曲的影響》，載《山西大學學報》1993 年第 2 期，第 53～58 頁。

〔註 7〕李修生：《元雜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註8〕，闞眞《論元雜劇的民族特色》〔註9〕，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這 20 年間，研究者注意到元曲的發展是與元代少數民族文化密切相關的，但這些觀點並沒有成爲元雜劇研究中的主流，總體成就也較爲有限，論文論著數量少，論證不夠深入。當時主流的觀點仍然是元代社會黑暗、民族歧視嚴重、廢止科舉等造成了讀書人仕進無門、困頓窘迫，最終不得已走上了元曲創作的道路。形成這種觀點的主要原因是，學術界長期以來被漢族文化傳統的思維模式所禁錮，把元曲與漢唐宋明清文學納入同一思維模式和評價體系中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當然無可非議，也的確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果沒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褒揚傳播，就不會有元曲崇高的歷史地位，元曲研究也就失去了根基。然而，如果始終把元曲置於中原文化背景之下，忽略了蒙元社會特殊的多元文化格局，這必然造成元曲研究的困境——文化歸屬上的尷尬導致文學研究無法突破瓶頸，難以深入。

本世紀 10 年來，元曲與民族文化的關係研究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出版、發表了一系列的論著、論文。其成果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大類：

第一，元代多民族文化對元雜劇的影響。其間又可以分爲兩類。

一是少數民族文化對雜劇有很大的影響，使元雜劇本身帶有明顯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印記，其中蒙古族對雜劇的影響研究比較多。主要論文有扎拉嘎《游牧文化影響下中國文學在元代的歷史變遷——兼論接受群體之結構變化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註10〕，高益榮《「曲始於胡元」文化論》〔註11〕，等等。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雲峰的《論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對元雜劇繁榮興盛之影響》〔註12〕，研究涉及蒙古族音樂舞蹈、語言文字、統治者的愛好、寬鬆的政治環境等各個方面，另外對蒙古族雜劇家創作的貢獻也有論述，說明蒙古族及其文化對元雜劇的繁榮興盛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是論述元雜劇的發展繁榮與民族文化交融的關係，認爲二者密不可

〔註8〕葉蓓：《淺析蒙古族文化對元雜劇形成及發展的影響》，載《民族文學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72～76 頁。

〔註9〕闞眞：《論元雜劇的民族特色》，載《民族藝術》1997 年 4 期，第 105～112 頁。

〔註10〕扎拉嘎：《游牧文化影響下中國文學在元代的歷史變遷——兼論接受群體之結構變化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載《文學遺產》2002 年第 5 期，第 57～69 頁。

〔註11〕高益榮：《「曲始於胡元」文化論》，載《中國文學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1～14 頁。

〔註12〕雲峰：《論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對元雜劇繁榮興盛之影響》，載《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 期，第 15～19 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主要論文有李成《金代女眞文化對元雜劇繁榮的影響》〔註 13〕，田同旭《論草原文化對古代戲曲形成的影響》〔註 14〕、《論古代戲曲的形成與民族文化融合》〔註 15〕等等。曲阜師範大學 2009 屆徐雪輝的博士學位論文《元雜劇文化研究》〔註 16〕，以「文化」爲視角、以「關係」爲出發點和落腳點，研究元雜劇與文化的關係。她認爲：「元代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處於一種游牧文明與農業文明、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雅文化與俗文化等多重交融的狀態，戲劇有了新的生存的土壤，」雜劇成爲一種流行藝術，被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對元雜劇中的少數民族特色的分析。多討論元雜劇中表現出的民族文化融合的因素，從少數民族的某種特徵入手，尚未深入討論「融合」。

更能代表這一領域研究成就的是以下幾部論著。山西大學田同旭教授的《元雜劇通論》〔註 17〕，是一部元雜劇研究通論，在金元民族文化衝撞與融合的多元社會文化背景下，從理論上系統地論證了元雜劇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藝術結晶。雲峰先生致力於蒙漢文化與文學關係研究 30 年，出版了多部專著。2005 年出版的《元代蒙漢文學關係研究》〔註 18〕，著重描寫元代蒙漢文學關係的歷史脈絡，並從社會歷史文化背景、詩歌、雜劇、散曲等幾個方面去論述。2011 年出版的《民族文化交融與元散曲研究》〔註 19〕，以元散曲爲對象，研究蒙古及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對散曲創作的影響。正如李修生先生在該書序中所言：「研究問題注意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性，注意多元互動，對待民族問題客觀全面，很值得學習。」〔註 20〕2012 年出版的《民族文化交融與元雜劇研究》，以民族文化交融爲背景對元雜劇進行了專題研究，主要包括雜劇創作

〔註 13〕李成：《金代女眞文化對元雜劇繁榮的影響》，載《黑龍江民族叢刊》2007 年第 1 期，第 171～178 頁。

〔註 14〕田同旭：《論草原文化對古代戲曲形成的影響》，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 第 5 期，第 129～133 頁。

〔註 15〕田同旭：《論古代戲曲的形成與民族文化融合》，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2 期，第 88～93 頁。

〔註 16〕該論文已成書出版，徐學輝：《文化視角下的元雜劇》，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註 17〕田同旭：《元雜劇通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註 18〕雲峰：《元代蒙漢文學關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版。

〔註 19〕雲峰：《民族文化交融與元散曲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註 20〕李修生：《民族文化交融與元散曲研究・序》，見雲峰《民族文化交融與元散曲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 頁。

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少數民族文化藝術及其政治經濟對雜劇繁榮興盛的影響，俗文學成爲元代文壇主流論，民族文化交融與愛情婚姻雜劇，雜劇大團圓結局與民族文化交融，反映多民族關係和描寫北方少數民族生活之雜劇，北方少數民族雜劇作家及其創作等七部分。尤其是對於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狀況及少數民族文化對雜劇繁興的影響，資料詳實，分析鞭闢入裏，爲元雜劇乃至元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厚實的文化背景。

以上是元雜劇及其與民族文化交融關係研究的基本狀況，至於元雜劇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則多限於類型人物和個體的研究。類型人物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文人形象、宗教人物等形象研究上。唐昱《元雜劇宗教人物形象研究》〔註 21〕通過對雜劇中宗教人物形象的梳理、探討，揭示雜劇所蘊含的宗教精神和藝術價值，理清雜劇與宗教的關係。劉麗華的博士論文《元明雜劇文人形象與劇作家心態變遷研究》〔註 22〕，通過對元明雜劇中文人形象的剖析，考察在時代變遷中的文人心態與雜劇中文人形象的關係，從而發掘元明雜劇發展變化的影響因素。李成論文《民族文化融合與元雜劇女性形象性格新舊質素交融審美特徵的形成》〔註 23〕，注重探討元雜劇中女性形象的新舊性格質素，及民族文化融合對其形成的影響。王傳明《文化衝突與元雜劇中妓女形象的突變》〔註 24〕，認爲妓女形象在元代愛情劇中的被美化和在家庭生活劇中被醜化，是源於商業文化、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衝突。羅斯寧《元代商業文化和儒家文化對元雜劇的影響——元雜劇商人形象新解》〔註 25〕，認爲元雜劇中出現的性格鮮明的商人形象是元代商業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同作用的產物。人物個體研究以《西廂記》中的崔鶯鶯、張生、紅娘等，還有李千金、張倩女、竇娥等形象爲多。

可以看出，近年來的元雜劇人物形象研究中，多元文化背景已經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多數研究者摒除傳統的論調，改變以往對元代社會、文

〔註 21〕唐昱：《元雜劇中的宗教人物形象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 年版。

〔註 22〕劉麗華博士論文：《元明雜劇文人形象與劇作家心態變遷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08 年版。

〔註 23〕李成：《民族文化融合與元雜劇女性形象性格新舊質素交融審美特徵的形成》，載《藝術百家》2007 年第 7 期，第 114～119 頁。

〔註 24〕王傳明：《文化衝突與元雜劇中妓女形象的突變》，載《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1 期，第 51～55 頁。

〔註 25〕羅斯寧：《元代商業文化和儒家文化對元雜劇的影響——元雜劇商人形象新解》，載《上海戲劇學院學報》，2002 年第 6 期，第 80～85 頁。

化一味否定的觀點，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元曲與民族文化交融的關係問題。現有成果中不乏精彩之處，但還大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如現有研究多個案分析，沒能從整體上考察雜劇人物形象與民族文化交融的關係，缺乏全面的觀照；現有成果中，由於某些學者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化存在隔膜感，導致某些論述不夠深入；雖然注意到了民族文化交融對雜劇人物形象塑造的影響，但是仍然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場上看問題，這就容易出現評價上的偏頗。而且，民族文化交融本身包含著交流融合，進而整合而成爲元代特有的多元文化，這一過程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也不是一次能夠完成的，它是經歷了多次的多向的交流融合，這方面少有論述；文化交融涉及多個民族、多種文化，甚至是跨越我們今天國界的文化。這些都成爲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同時，對於文學研究而言，不能爲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體現出研究的現實意義，所以元雜劇與民族文化融合的研究本身是可以爲現實提供幫助的。元雜劇反映了元代怎樣的時代特徵？元代的多元文化怎樣滋養了元雜劇？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有助於我們今天的戲曲發展。只有眞正瞭解了民族文化融合怎樣影響了元雜劇的發展繁榮，才能眞正理解中華民族文學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這對於研究民族文學史、民族關係史也會有所裨益。

二、研究對象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對雜劇中的人物形象進行宏觀把握，特別是重點發掘其中與民族文化交融相關的形象進行分析，探尋其中的關聯與意義。所以對於雜劇中眾多的人物形象未能面面俱到。在作品的選擇上，不以傳統的、公認的藝術成就爲標準，而是把體現民族文化交融作爲取捨條件。對於某些多方面表現文化交融的作品，如《西廂記》中的人物形象則不厭其細，在多章中多次出現其中的人物。將雜劇人物形象與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相聯繫，作全面系統的研究，正是本文的特色所在。

此外，蒙古族是元代的統治民族，其文化在元代居於優勢地位。而且，蒙古族武力征服的過程較長，即使在建立元朝之後仍然東征西討，相對於其它北方少數民族，更能代表北方游牧文化。故而，在文中論及北方游牧文化，常常以蒙古族文化爲代表。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民族文化交融爲背景，討論雜劇中人物形象的特色，及其與民族文化交融的關係。論文共四章，前有緒論，後有結語。第一

章，敘述元代雜劇創作的背景，從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兩個方面勾勒出當時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時代特色。其後三章分別以女性形象、書生和商人的形象、僧道官吏形象爲考察對象，從形象分析入手，以體現民族文化交融爲旨歸，證明中原的農耕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草原文化，共同滋養了元雜劇的生長。元雜劇的各類人物形象，多方面地體現了這種民族文化交融，這更能進一步證明中華民族的文化是由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

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文獻分析法：盡可能多地佔有資料，查閱前輩學者搜集、整理、校對的雜劇資料和社會背景資料；儘量全面地掌握相關領域的研究現狀。

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法：對於元雜劇產生、發展的社會背景作全面地考察，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作家；對具體劇本細緻解讀，以期在正確理解文本的前提下，對人物形象所體現出來的民族文化融合做出正確科學的歸納。

比較分析法：比較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漢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找到各自的特點，這是研究的基礎。通過比較同一人物形象在不同時代的變化，發現差異，分析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及其與民族文化交融的關係。

第一章　元雜劇創作的時代背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時代

13 世紀初，鐵木眞經過多年征戰，統一了蒙古高原上的大部分部落。1206 年，蒙古諸部在斡難河畔召開大會，推舉鐵木眞爲大汗，號稱「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汗國。從此，蒙古高原諸部落由原始社會進入了早期的封建社會，開始了它消滅遼夏金宋和征服歐亞大陸的戰爭，並最終建立起東起朝鮮半島，西到東歐的龐大帝國。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71 年，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義，定國號爲大元，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9 年，南宋殘軍與元朝展開大海戰，最終爲元所滅。至此，元朝徹底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近 500 年的分裂割據局面，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封建王朝，爲後來明清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第一節　社會政治經濟背景

一、疆域闊大，人口衆多，多民族雜居共處

元朝是一個疆域空前闊大的時代，其版圖之廣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自封建變爲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註 1〕「若夫北庭迴紇之部，白霫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蟻聚，俯伏內向，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

〔註 1〕（明）宋濂等撰：《元史・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版，第 1345 頁。

之盛大者矣」〔註2〕。漢有北狄之患，隋不能服東夷，大唐則西戎不定，宋朝更是西北邊患伴隨始終，它們的疆域遠不能和元朝相比。

在這片廣袤的國土上，「地大民眾」〔註3〕。13世紀前半期，各族統治階級爲爭奪統治權，頻頻發動戰爭，造成了社會物質財富的損耗和人口的急劇減少，尤其是作爲主戰場的黃河流域破壞極爲嚴重。隨著全國統一局面的出現，各地生產力恢復，人口逐漸增加。由於元朝從未在同一年對全國的人口數額進行統計，每次統計人口，都是將新籍戶地區的人口數，加上未籍戶地區的原有人口數，得出全國總人口。這樣的統計方法，當然難以得出確切的全國實際人口數，但可以據此看出當時的人口增長情況。

> 太宗……七年乙未，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憲宗二年壬子，又籍之，增户二十餘萬。世祖至元七年，又籍之，又增三十餘萬。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奇。於是南北之户總書於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註4〕

太宗七年（1235）年北方三十六路有87萬餘戶，到憲宗二年（1252）增加了20餘萬戶，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增30餘萬戶，35年間，北方增加了50餘萬戶。可見，隨著統治的鞏固，社會逐步穩定，人口逐步增加。而南方，尤其是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廣等地，生產力一直較北方發達，人口數遠遠超過北方，到至元二十七年時南方戶數接近北方的9倍。

元代人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多民族雜居共處。境內居住著蒙古族、漢族、畏吾兀、回族等各個民族，各族之間如犬牙交錯般相互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飽受詬病的「四等人」制爲例，它按照民族成分把人分爲四等，第一等爲蒙古人，是元代的「國族」、統治者的「自家骨肉」，享有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特權，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指我國西北各少數民族和元朝境內的中亞及歐洲各民族，他們是蒙古人

〔註2〕（元）趙世延等：《經世大典序錄·帝號》，見蘇天爵編：《元文類》卷40，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529頁。

〔註3〕（明）宋濂等撰：《元史·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346頁。

〔註4〕（明）宋濂等撰：《元史·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345～1346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